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基辛格的 外交思想与战略

龚洪烈 著

“基辛格症候”指的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决策层之间角色互换的现象。

作为著名的国际关系思想家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基辛格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关于均势、国际秩序、政治家才能的理论阐述，也在于他所参与构建的20世纪70年代外交革命实现了冷战格局的革新。

他成功地将思想一致性融入了美国外交政策行为的目标。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基辛格的 外交思想与战略

龚洪烈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 / 龚洪烈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 朱瀛泉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744 - 1

I. 基… II. 龚… III. 基辛格, H. A. (1923 ~) - 美国
对外政策 - 思想评论 IV. K837. 127 = 5 D87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4727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 朱瀛泉主编
书 名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
著 者 龚洪烈
责任编辑 蒋桂琴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2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76 千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744 - 1
定 价 46.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i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丛书编委会

主编 朱瀛泉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计秋枫 卢明华 石 斌

洪邨生 蔡佳禾 谭树林

总 序

朱瀛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局面。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足于过去的“国际政治”。18 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当初创造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今 200 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而生长发展,是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同国家战略目标与和平发展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过去的 30 年间,我国这个领域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自觉有了显著的提高,一是增强了把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的意识,二是致力于建立学术研究与国际关系实践中新问题、新趋势的联系。这些努力使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保持了应有的活力。而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与外部世界交融的日趋密切,我们的学科建设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坐标上,创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已成为学术界共同的愿景。我们知道,世界政治是一个连续性和可变性并存的社会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任务不仅要说明国际体系是怎样变化而且要说明应该怎样变化,因而它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实践与命运、具有规范性研究特性的学科。美英等西方国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时间比较长,基础理论发达,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在学理上认真学习借鉴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特别是主流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经验及其对现代历史的理解构建起来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或思想判断上的偏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作为理论思维的指导,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化之路不能重蹈西方的老路,它完全有可能建立在将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结合并以此来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础上,以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规范要求。任何的学术进步和理论创新只有在扬弃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惟有循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才会实现共同的愿景。

这套丛书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依托国家 985 工程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而组织筹划,并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从 2009 年起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出版,既受泽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之优良学统的浸润,更得惠于丛书作者们之激奋于时代和国家

发展的感召。该丛书的意旨在以全球视域为基点,结合有关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着重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丛书内容丰富,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全球治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体性、20 世纪以来的国际史、全球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大国外交和战略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历史和现状三大方面的领域。我们希望,这套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丛书的出版,将对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事业有所帮助。是所望焉,谨此序。

2008 年 10 月于南京

目 录

总序	i
引论 基辛格:外交舞台上的智者	001
一、基辛格症候	002
二、基辛格理论的政策学倾向:为行动的理论	006
第一部分 外交思想	015
第一章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	016
一、基辛格学术思想的渊源	016
二、基辛格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	027
第二章 国际秩序模型与国际体系的演变	047
一、权力概念的衍变	048
二、国际秩序:合法性与和平	054
三、国际秩序:均势与和平	061
四、合法性与均势的结合构成稳定的国际秩序	066
五、稳定国际秩序模型的历史形态与国际体系演变	068
六、结论	091
第三章 基辛格与美国外交传统	096
一、美国外交传统的岛国性质	096
二、美国例外论	101
三、传统与现实的矛盾: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	109
四、结论:基辛格与美国外交传统	120
第四章 政治家才能与对外政策	125

一、官僚政治与政治家才能	125
二、外交政策中的政治家	131
第二部分 战略批判与战略构想	137
第五章 核时代的美国战略:有限战争	138
一、二次大战后的国际秩序——革命年代与核武器的影响	139
二、遏制政策的困境	142
三、神秘莫测的战略:全面战争	144
四、有限战争:必要性	148
五、有限战争:类型与形式	152
六、有限核战争?	156
七、结论:核战略的困境	162
第六章 和平的结构:作为战略家的理念	173
一、基辛格与尼克松:权力伙伴	173
二、从统治到领导:新战略的需要	182
三、外交协调:革命国家纳入国际体系	184
四、文化-国家模式论	187
五、欧洲:麻烦的伙伴关系	190
第七章 中美关系的重建与三角外交	204
一、中国:基辛格的观念	204
二、中美关系的重建:战略机遇的到来	210
三、中美关系的重建:台湾问题与战略共识的形成	218
四、中美关系:从三角外交到战略协调	231
第八章 缓和与美国的对苏(俄罗斯)战略	236
一、基辛格观念中的俄罗斯外交文化与传统	236
二、外交协调:缓和与关联战略	240
三、外交对手:从苏联到新俄罗斯	243
第九章 美国卷入地区冲突:越南战争	251
一、体面的和平:一项战略的形成	251
二、战争的升级:为了撤退的战争	262
三、和平谈判与外交	292

四、尾声：美国在越南的失败	302
第十章 美国卷入地区冲突：中东	305
一、中东战争与穿梭外交	305
二、种族冲突与人权外交	315
三、伊拉克战争	321
结论 基辛格的遗产	329
一、基辛格外交政策思想的特征：基辛格的思想遗产	330
二、跨越文化鸿沟：基辛格的外交遗产	333
后记	337
主要参考文献	340
索引	352

引论 基辛格：外交舞台上的智者

作为一个自 70 年代以来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 ）几乎一直是以外交家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同时，由于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作用，不仅其轰动效应十足、篇幅宏大的外交生涯回忆录，而且其主要学术著作都有中译本出版^①，此外一些研究基辛格本人及其外交活动的著作（特别是早期，即 70 年代中后期间世的著作）也有中译本问世。因此可以说基辛格及其著作是在中国有着极高关注度的一个现象。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基辛格及其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却相对缺失^②，这表现在对如此高关注度对象的研究数量稀少，而且缺乏基于全面文本分析的系统研究。本书试图在全面解读基辛格著作文本的基础之上，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角度对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及其外交战略进行系统化的研究。

本章的标题表达了笔者对于美国 20 世纪最富争议性的外交决策者的基本评价。作为尼克松-福特总统任内外交政策的设计者与主要执行者，基辛格将其学术研究中形成的思想理念应用到外交政策的设计中，实现了对外政策研究与对外政策制定的结合；他所参与设计与实

① 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担任美国外交决策人之前出版的重要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中译本出版于 1959 年，而这部著作英文本的出版年代为 1957 年。在中美敌对的那个年代，基辛格的这部著作显然是被中国视为美国官方核战略的表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早在作为外交家的基辛格出现之前作为战略思想家的基辛格所具有的影响力。

② 陈有为于 1980 年出版的《基辛格评传》是国内填补空白之作，但基本停留在评介阶段；刘靖华于 1997 年出版的《霸权的兴衰》中辟专章作“基辛格霸权战略分析”，论述了基辛格关于均势、外交战略及权力与道德关系等方面的思想；巨永明 2005 年出版的《核时代的现实主义：基辛格外交思想研究》分析了基辛格的外交思想。

施的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关系史上极富戏剧性的外交革命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后以来紧张对立的国际局势,对于迄今为止的国际格局演变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代表了从修昔底德以来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基本智慧,他的外交成就与思想成就都源出于此,同时他的局限性也与此密不可分。

一、基辛格症候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面临结构性调整的时期。一方面,对立的两个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从波兰、匈牙利事件到布拉格之春以及中苏分歧与冲突表明所谓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铁板一块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而随着西欧经济的复兴,西欧对美国的战略依附性已经大为降低,西欧国家在法国和西德的率领下走上了政治外交自主的道路。另一方面,苏联的国内体制步入僵化时期,畸形发展的经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缓解经济体制的弊端是苏联调整对外政策的国内动因;而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遭遇其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对外政策困境,战略调整势在必行;随着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公开化,双方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凸现,苏联上升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国也很难不修正其与美苏同时敌对战略。因此,几乎所有的具有战略影响的大国都有对战后国际关系体制的结构性调整需要,结构调整的动力来自于各方。

这一时期的结构调整成为国际关系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外交革命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此后国际格局演变的方向。基辛格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两任美国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1969—1975)和国务卿(1973—1977),参与了这一时期一系列改变国际关系面貌、重构国际格局的外交事件: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由两极对抗转向三角外交;美苏之间的“缓和”与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中东穿梭外交,开启中东和平进程;调停塞浦路斯的种族冲突及推进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正式结束越南战争(他因此和越南的黎德寿共同获得了 1973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基辛格以其娴熟老练的外交技巧和舌战大师的雄辩,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水门事件丑闻愈演愈烈之时,尼

克松总统已经很难正常履行总统职责,基辛格这时几乎成为美国外交的最高决策人。虽然这时候尼克松任内所有重大的外交战略决策已经完成,但是,基辛格在这一时期远远超越了总统最高顾问和最高外交行政长官的作用。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务卿,他的权势也达到顶峰。跟随基辛格进行环球采访的著名记者、时政评论员理查德·瓦莱里安尼(Richard Valeriani)认为:“基辛格是一个被作为国家首脑对待的国务卿。当他出访时,总是与头号人物打交道: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共产党领袖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总统、首相以及国王。基辛格访问外国首都后是以总统式的格式发表公报,(外国)政府用阅兵仪式来欢迎他。基辛格实际上成为外交事务的副总统。”^①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也认为:“他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使他成为了一种联合总统,特别是在政府陷入水门事件的漩涡之时。”^②达莱克是以研究美国总统外交政策著称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对象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引人注目的是,在他最新的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将尼克松与基辛格并列进行研究,而其他总统任内的总统外交助手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影响力。在退出公职之后,在经营财源滚滚的环球商业咨询业务之时,基辛格还继续广泛的环球旅行,充当民间外交使者,继续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人物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自1971年7月具有历史意义的秘密访问之后迄今近五十次访华(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他卸任以后,他在任期间九次访华,最近的一次访问是2009年1月到北京参加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③发挥了强大的民间管道作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即使在任内,基辛格也是一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迄今为止,同样的对基辛格及其外交政策的争论依然在继续着。批评者们指责他是

① Richard Valeriani, *Travel with Hen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9, p. 33.

② Robert Dallek, *Nixon and Kissinger: Partners in Pow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7, p. IX.

③ Henry Kissinger's Address to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pkins-Nanjing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June 23, 2007.

1969年秘密轰炸柬埔寨及次年入侵该国造成大量贫民伤亡的罪魁；他卷入了1970年至1973年推翻智利民主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总统的阴谋活动；他还为1975—1976年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大开绿灯；此外还有传闻指控他将越南和平谈判的敏感信息透露给共和党从而帮助尼克松“窃取”了1968年大选的胜利。对其外交手段的批评集中在他和尼克松绕过民主程序，打击不同意见的专家，实施权力高度集中的秘密“宫廷外交”，从而给美国外交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基辛格不再是拯救和平的外交魔术师，而是一个对权势孜孜以求的“战争罪犯”。^①

同样重要，也与本书研究最为相关的是，基辛格是战后重要的国际关系思想家和战略观察家。作为战后美国所谓的“基辛格症候”(the Kissinger Syndrome, 指6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决策高层与国际关系学界精英之间的角色转换)最突出的代表，基辛格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因《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而声名鹊起，获得了“战略理论家”的美名，成为现实主义传统学派的重要一员。^②自50年代初基辛格开始其学术生涯至本世纪初的半个世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时期。40年代末、50年代初冷战达到第一次高潮，这也是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如日中天之时。基辛格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现实主义的理论预设(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人生经历、人生哲学及学术背景与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有着相当的契合)，并根据他对19世纪外交史特别是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外交的研究试图发展出一整套政策建议。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基辛格的对策是“精致的、原创

① 赫什、希金斯的两部著作分别成为两个时期对基辛格持严厉批评立场的代表。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Christopher Hitchens, *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 London: Verso, 2001.

② Smith将基辛格列为现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六大思想家之一，Michael Josef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ead将基辛格称为“现实主义大师”(the Archrealist)，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1, p. 139; Alker和Biersteker认为基辛格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者”，Hayward Alker and Thomas Biersteker, “The Dialectics of World Order: Notes for a Future Archeologist of International Savoir Faire”,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7.

性的和勇敢的”^①。显然从一开始基辛格的学术旨趣就不在于纯粹的学理思辨和理论建构,他的目标是“经世致用”,他关于梅特涅和俾斯麦外交的研究目的是从历史中寻求纵横捭阖的哲学与谋略。自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以来,基辛格就经常来往于哈佛大学所在地坎布里奇和华盛顿之间,充当政府外围的兼职政策顾问,基辛格也就此将其学术研究与美国的对外政策更直接更紧密地结合起来。1969年,基辛格从哈佛教授成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为实践其外交理念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和平台。在此后担任美国外交政策主管的八年内他成为世界风云人物,由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导演的美国外交政策调整既有类似于“打开中国”和美苏“缓和”与谈判的巨大成功^②,也有类似于“缓和”步入停滞的痛苦以及越南北方统一南方、北越人民军攻陷西贡所标志着的美国越南政策的彻底崩溃这样的巨大失败,但无论如何基辛格个人及其外交理念对这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塑造作用。1977年退出公职之后的基辛格并不愿离开政治舞台,他所创办的全球商务咨询公司“基辛格伙伴公司”使他继续广泛的环球旅行,与世界的政界、商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不断著文立说,发表演讲,指点江山,出现在主流媒体的采访中(例如,尽管当时身在德国,但基辛格是9·11事件后最早接受媒体采访的显要人物之一)^③,试图保持他对现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事实上,基辛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是华盛顿光彩夺目的政治明星,在他卸任两年后,他在华盛顿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卡特政府中包括总统本人在内的所有的政要,并且这样的趋势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④更为重要的是,基辛格的影响力是有实际内容的,福特总统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都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求他提供咨询,他是前任小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的秘密外交顾问,经常为

① 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p. 129.

② Opening China 一词是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学者们在论及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时通常使用的概念,带有强烈的美国中心论的色彩,笔者在这儿只是引用并不认同,笔者认为在论及中美关系的那一段历史时所使用的另一个词 *Rapprochement*“(中美关系的)重建”是一个更合适的概念。

③ Jussi Hannhimäki, “‘Dr. Kissinger’ or ‘Mr. Henry’? Kissingerology, Thirty Years and Counting”,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7, No. 5, November 2003.

④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 706.

总统提供咨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影响比较大。在2006年下半年他还明确向布什政府提出了伊拉克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类比,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布什政府内对这一类比一直讳莫如深。基辛格明确反对撤军,他还援引他在越南战争时期所提出的“盐花生米”的比喻,认为一旦开始撤军,公众就会像吃了一点“盐花生米”但却没有满足其胃口,以至于要求更多的“盐花生米”那样,也会要求更多的撤军,直至军队全部撤出为止。^①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冷战体系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现实主义理论对此的预测和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其理论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理论迅速收复失地,大有压倒现实主义理论的趋势。这样一种历史和理论的重大变迁对基辛格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冷战后出版的著作中基辛格虽然坚守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但也不得不对冷战后在美国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潮让步,他写道:“过分的‘现实主义’产生停滞;过分的‘理想主义’导致十字军行动以及最终的幻灭。”^②他还为自己促成了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而自豪,而在此之前赫尔辛基协定是为现实主义者所诟病的。他还在其著作中大肆渲染他在推进罗德西亚实现多数人统治及避免塞浦路斯、黎巴嫩种族冲突中的作用^③,开始关注全球化、人道主义干预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原则、普遍司法权问题等等。^④

二、基辛格理论的政策学倾向:为行动的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肯尼斯·汤普森(Kenneth W. Thompson)曾经有这样一个论述:“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警告:如果一个人试图在政治

① “Kissinger’s ‘Salted Peanuts’ and the Iraq War”, <http://www.gwu.edu/~nsarchiv/news/20061001/index.htm> (accessed October 29, 2006).

②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p. 286.

③ See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pp. 192 - 242, pp. 985 - 1018.

④ See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234 - 282.

领域同时充当行动者和观察者，他将在两个领域都遭到失败。”^①基辛格在政治行动的领域与观察的领域却都获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功，虽然他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就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取得的。他是声誉卓著的哈佛教授，早年的学术著作依然是重要的学科文献，后期的回忆录和著述总是受到决策者和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虽然他的外交成就往往是争论的焦点，但也很难被即使是最尖锐的批评者所忽视，在他之后，美国国务院的继任者还从没有达到过他所拥有的声誉^②（虽然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基辛格是美国最成功的国务卿）；基辛格还是媒体的宠儿，是经营年收入数百万美元的环球商务咨询公司的主席……虽然我们并不能说基辛格打破了奥本海默的论断，但是基辛格的成功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实际上基辛格自身很少将政治的行动领域与观察领域作严格的区分，政策研究与政策分析的领域仿佛是政策战略设计与推行的预演，无论是早期作为一个比较纯粹的观察者，还是离开公职后以一个资深政治家的身份指点江山，基辛格的学术研究旨趣与现实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其研究的强烈“政策学”倾向。

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按照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的划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规范’或‘价值’理论（是）‘应伦理的急需’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是肯尼思·汤普森在其论文中给出的定义。这类理论产生于政治哲学。一个好的案例是康德（Kant）的在一个代议制共和国中组成的世界联邦的永久和平理论；（2）‘经验主义的’或‘因果的理论’，它试图说明实际的政治行为，指出主要的变量，例如均势理论为18世纪和19世纪国际关系提供了答案；（3）‘政策学’或一套关于行动诀窍和有关政治家才能的系统的规诫的理论。这类理论力图对‘适应时代的思想需要’有所贡献；心理战争或军事战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当代的案例。”^③概括这一划分，如果说基辛格早年在其大学毕业论文《历史的意义》等著作中主要解决的是其价值观

① Kenneth W. Thompson,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jor Twentieth-century Theorists and the World Crisi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86.

② 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p. 127.

③ Stanley Hoffmann,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0, p. 8.